

资政参考 敬请阅览

视点

第 17 期

镇江市图书馆主办

2012年11月15日

ZHEN JIANG LIBRARY

本期 导读

- ☆福利中国 让人民满意
- ☆十八大话语新风短实新
- ☆从十八大代表构成看党的新气象
- ☆十八大后中国改革道路有何选择
- ☆广东多项新规从严治党
- ☆改善民生要从满足群众基本需求抓起
- ☆启动“大国公关”迫在眉睫

欢迎登录镇江图书馆网站: <http://www.zjlib.net>



镇江名人（九十九）

革命志士——戴祥(1919—1947)，原名宗祥，小名锡宝，大路乡西堰戴村人。父早逝，家贫失学。14岁至启东汇龙镇学徒两年。因不堪老板凌辱，去沪当店员，“八·一三”事变后回家务农。山北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不久，参加民兵组织。民国33年(1944)加入共产党。次年初，任南元乡农抗会主任，后任民兵大队长，参与领导民众减租减息，开展游击活动，曾活捉特务张恒达送抗日民主政府审讯处决。6月，率全乡民兵配合新四军一举摧毁姚桥小庵日军据点。次年10月北撤，进苏中公学学习，结业后任启东和合区财粮股办事员，团结乡财经组长。民国36年3月，国民党军占领启东多数乡镇，建立据点，四处“清剿”，大批优秀党员、翻身农民惨遭杀害，革命斗争形势日益险恶。戴化装成小贩、工匠，穿插于敌人密集据点之间，与敌周旋，白天隐蔽，夜晚活动。遇敌时便潜入水中，以备用的芦苇管伸出水面呼吸。一天晚上，敌人强迫建立的“联保自卫队”开会，戴手提短枪，进入会场，对自卫队进行形势教育，指明前途，制服了自卫队，很快打开了坚持斗争的局面。5月2日，东南行署签发了功字第一号《嘉奖令》，赞扬戴“在3个月的反‘清剿’斗争中，英勇沉着，神奇机敏；紧紧地依靠群众，支撑了整个乡的局面。戴祥同志不但是一个模范的财经工作者，而且是反顽斗争的英雄。”号召全东南的同志向戴祥看齐。民国36年5月，戴任启东区路东地区财经所长。时因敌人经济封锁，供给十分困难，为筹集资金，戴乔装兑油农民，肩挑空油箱，闯入敌哨边的毛召福油坊，带出老板，宣传斗争形势，要求工厂、商店按章纳税。不数日，油坊、店铺陆续送来税金。敌人得知这一情况，大为恼怒，悬赏皮花50担，捉拿戴祥。6月7日，戴在东余乡桃园村活动，富农告密，被百余敌人包围，于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8岁。九专署《财经通讯》和南通地委的《江海报》，分别介绍其坚持斗争的英勇事迹，誉为“可歌可泣的坚持范例”。东南行署财经局将其事迹编印成册，行署主任干仲儒亲笔题字“精神不死的戴祥同志”。是年12月，改东余乡为戴祥乡，建国后，烈士遗骨已移葬于烈士出身地——西堰戴村。

供稿：镇江市图书馆文献开发部

改善民生要从满足群众基本需求抓起

十八大代表、中共镇江市委书记张敬华在讨论十八大报告时表示，报告强调“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我们在实践中感受非常深刻。

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把民生改善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是要坚持以主动、真诚的姿态，回应人民群众对基本民生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诉求，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只有首先把基本民生问题解决好了，才能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

张敬华说，镇江在改善民生方面将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工作。

一是抓“两增”，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就业。这是最基本的民生。镇江这几年积极创建“充分就业市”，突出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增收，取得明显成效。

今年1-9月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分别增长15%、14.6%，增幅均比去年底前移2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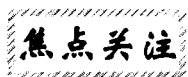
二是抓“两控”，控制物价、控制房价。这也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1-9月CPI比江苏平均水平低0.3个百分点；商品房及商品住宅成交均价均列全省第8位。

三是抓“两保”，更高水平推进社会保障、住房保障。镇江医改走在全国前列，初步形成城乡一体、覆盖全民、普惠共享、运行高效、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今年，我们明确提出年内全面消除一年以上逾期安置。

四是抓“四公两场”，就是向人民群众提供公交、公厕、公园、公墓和菜市场、停车场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10月10日起公交票价降到全省最低，实施一个月客运量累计增幅达到24.3%，比实施公交提升战略前高出14.2个百分点。

五是抓“两提”，全面提升人居环境、提升生态环境。主动呼应人民群众对生态和人居环境的新诉求，着力打造山水花园城市，3年内投资2700亿元、完成1000万平方米老城区危旧房和城中村改造，同时，推进新市镇、新园区、新农村“三新”建设、“万顷良田”工程和村庄环境整治，加快城乡一体化步伐。

——摘自《名城镇江网》



福利中国 让人民满意

关键词·十年成就

重振道德 社会发展令人瞩目

“自英国工业革命在 18 世纪末开始后，这是世界见证过的最令人惊奇的经济变革。世界正越来越多地被中国改变。”英国广播公司网站说，中国过去 30 年来经济腾飞，年增长率高达 10% 左右，这一切是在中国政府的决策下取得的。

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思曾先后到访乌鲁木齐、北京、宁波以及其他许多中国城市。回首历次中国行，他说：“中国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令人瞩目。”

韩国《朝鲜日报》认为，在过去 10 年间，中国政府在社会领域得到了肯定的评价。报道历数 10 年巨变：两岸关系得到改善、实现“三通”；中共提出“科学发展观”，努力消除城乡间不均衡；废除农业税，在农村地区推行医疗和养老保险；全面推进“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政策。

新加坡《联合早报》还认为，过去 10 年间，中国政府注意“重振道德”。文章认为，中国政府与民间大力宣传仁爱与同情心，而此举也取得成效，在中国一些城市可以看到“雷锋精神”展现，与过去那种“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冷漠形成对照。

关键词·保障民生

福利中国 政府满意度提升了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他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表示，过去 10 年，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数以百万的中国人民摆脱了贫困。

英国《卫报》也在题为《“黄金十年”构筑福利》中写道，中国已开始进入“福利中国”阶段。报道称，中国已经搭建起了福利国家的架构，并通过医保、养老金和免费午餐等形式开始让人民享受福利制度。文中援引世行经济学家王德文的观点称，“政府干得非常好。他们设立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并动员全社会资源实现这些目标。”

文章中称，10 年前，中国养老保险覆盖面为 1.47 亿城镇就业人口和 5500 万农民，如今已涵

盖 2.29 亿城镇就业人口和 4.49 亿农村和城镇居民。1.24 亿中国人已开始领取养老金。几年前，仅 20% 农村居民享有医疗保险，如今 96% 的农村人口都已覆盖。

哈佛大学的托尼·赛齐通过研究发现，在 2003 年至 2011 年间，政府的满意度提升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穷人”和“富人”群体都对政府的满意度明显提高。

关键词·经济发展

十年巨变 筑下坚实财政基础

韩国《朝鲜日报》在题为《十年巨变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文章中称赞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执政的 10 年间，中国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文中称，在过去 10 年间，中国年均增长率高达 10.7%，而且在 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02 年仅为 1135 美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到去年已经增加至 5432 美元，增加了 3.7 倍。

文章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均 GDP 已达到 1 万美元以上，从整体来看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另外，在此期间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 3 万亿美元，而且国家债务仅为 GDP 的 40%，构筑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新加坡《联合早报》8 日刊登评论文章称，原来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尚不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但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一跃而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而当前的中国又开始了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的转变。

美国《时代》周刊认为，作为全球政治经济大国，中国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希望，也将决定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势。分析认为，十八大提出的经济政策导向将直接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

此外，各国媒体普遍看好并希望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城镇化，扩大内需，加强科技创新。英国《金融时报》刊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的观点，认为未来 10 年，中国领导层将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关键词·海洋权益

海洋强国 中国扮演新的角色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胡锦涛在十八大的报告中提到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英国《金融时报》今晨一篇题为《中国要成为海洋强国》的报道称，自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以来，中国 10 多年来更加关注海洋权益。过去 10 多年来，中国海军现代化的投入越来越高，非军事部门如渔政和海监的船队也得到扩充和现代化。

美国《外交事务》发表分析文章认为，十八大之后，中国将继续以积极的姿态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同时，中国将从国际规则的“应对者”转变为“制定者”，扮演新的角色。

德国“在线报道”网站也表示，中国近年来在自己国家周边海域的海洋活动十分活跃，但中方强调，国防建设的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领土的统一。

——摘自《文摘报》

十八大话语新风短实新

“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

诸如这样的短话、实话、新话，在胡锦涛的十八大报告中随处可见。同样风格的话语，还出现在正在参会的十八大代表口中。

十八大代表、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这样介绍“天下第一村”经验：“听中央的精神不走样，听外国的声音不走神，听老百姓的声音不走偏”，“很土很实在”的调调令人耳目一新，难以忘记。

十八大代表、陕西省省长赵正永说，“民生永远是最大的主题。一切的发展都是：为了人、依靠人、发展人、人共享。”

“作为市长，我更多想问老百姓您幸福吗？”十八大代表、浙江永康市长徐华水这样谈“幸福”。

十八大代表、海尔集团 CEO 张瑞敏说：“只有时代的企业，没有成功的企业，所谓企业的成功，只不过是踏上了时代的节拍。”

十八大代表、江苏沭阳县委书记蒋建明说，老百姓是理性人，他们对政府的诉求是正常的，不能看成“捣蛋”……决不能把老百姓人为“对手化”。

说老百姓听得懂、听得进的“短话”、说“实话”不说官话、说“新话”不说套话，这股“短、实、新”的话语新风给严肃的党代会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

这种微妙的细节转变，呼应了胡锦涛十八大报告中“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论述。

胡锦涛在报告中说，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他还强调要“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评价说：“文风关系学风、作风和党风，这不仅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更是一个世界观和党性修养的问题。”

打动人心、与时俱进的语言，本身就具备无尽的正能量；党的文风是党内精神状态、政治生活的直接反映。新媒体引发的信息传播革命，正在改变整个社会的话语体系，其中就包括执政党的话语体系。

“文风的改变，标志并推动着政风的改变，这既是因应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需要，也显示出共产党正在把贴近群众、求真务实的执政理念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更体现了党在新时代的改革创新精神。”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赵振祥教授说。

“文风促党风。这证明，我们党不停地在训练自己，完善党的理论思路和作风建设。”十八大代表、著名作家二月河说。

实际上，中共近年来对文风建设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10年5月12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不良文风蔓延开来，损害党的威信，导致干部脱离群众，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失去感召力、亲和力。他进一步对改进文风提出“短、实、新”三方面的要求。

再往前回溯，在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曾指出：“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学风和文风，精简会议和文件，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对弄虚作假。”

如今，短话、实话、新话正在成为一种风尚，中共各级领导干部开始勉力而为，减少“长、空、假”，弘扬“短、实、新”。

今年7月初，中国东部浙江省天台县在选拔官员的考试中，要求考生用“微博”语言推广当地特产香鱼。台州市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处长郦森迪说：“这道题考的是文字功底，实则测试干部的文风、作风。正如微博提倡的，干部平时就要重提炼、讲短话。”

“集中财力，不撒胡椒面，干一件成一件，让老百姓和游客及时受益”“对那些‘混事官’‘糊涂官’‘老爷官’‘腐败官’，要敢亮红牌，坚决调整，严肃处理”……在十八大代表、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口中，这样的大实话比比皆是。

“代表们讲话很直白，不客套，能感觉到一种开放与坦诚。”香港文汇报北京分社高级记者罗洪啸说，通过与不少十八大代表的交流，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他们是“很接地气儿”的，这是中共顺应时代发展、锐意进取的积极转变。

人们更希望，当“短、实、新”成为流行的文风、话风时，党员干部也能在实际中进一步改革创新，为百姓更多更快更好地办出一件件实事。

——摘自《新华网》

从十八大代表构成看党的新气象

细数中共十八大代表构成，可以发现一些变化：基层党员的面孔多了起来，新一代“蓝领”党员多了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入党的党员多了起来……

25岁的十八大代表闫文静有多重身份：基层党员、进城务工人员、民营企业员工、“80后”……

闫文静告诉记者，来北京前她展开了密集调研，关注的问题包括基层党组织建设、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青年党员如何履行党员义务和职责等。

这位年轻党员最看重自己的“草根”身份。“大会期间，我要发挥基层党员作用，多提一些建设性意见。”闫文静说。

基层代表的增加基于中共中央对代表选举的明确要求：与十七大相比，省区市和在京中央企业系统代表中，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所占比例要增加，党员领导干部所占比例要减少。

增加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代表比例，相应减少党员领导干部比例，一直是中共党代会的趋势。中共十四大时这两个数据分别是22%和78%，十六大时为24.3%和75.7%。到十七大时，一线党员代表比例提高到28.4%。

十八大代表中，党员领导干部占69.5%，比十七大时降低2.1个百分点。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占30.5%，比十七大时提高了2.1个百分点。其中，省（区、市）当选代表中，党员领导干部占65.6%，比十七大时降低2.6个百分点；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占34.4%，比十七大时增加51名，提高了2.6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海军认为，提高生产工作一线代表的比例，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反映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和要求，另一方面说明中央决心扩大基层党员在党内事务中的作用。

代表的广泛分布，是衡量党员代表性的重要依据。中共十八大代表来自各地和各行各业，涵盖了经济、科技、国防、政法、教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管理等各个领域。

身材瘦削，面庞黝黑，十八大代表窦铁成的职业是工人，却常有人称他为老师甚至是教授。作为中国中铁一局的一名电力高级技师，他在工友眼中就是不折不扣的专家。

“作为一名现代工人，不能只满足简单的操作，更重要的是掌握现代技术。从这一点来说，岗位是我施展抱负的舞台，工地是我发挥才能的阵地。”窦铁成说。

工人代表数量大幅增加是中共十八大代表构成的一大鲜明特色。十八大工人党员代表由十七大时的 51 名增加到 169 名，占代表总数的 7.4%，比十七大时提高 5.1 个百分点；省区市和中央在京企业的代表中，工人党员占 10.4%，比十七大时提高了 7.1 个百分点。

这些工人党员代表，既有产业工人，也有驾驶员、营业员、服务员；既有国有企业的明星工人，也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技术能手。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成为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工人队伍注入新鲜血液。26 名农民工党员进入十八大代表行列，第一次以群体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

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中共十八大代表中，新时期入党的党员成为主体，表明中国共产党后继有人。

注重推优，是十八大代表选举中在结构比例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京清表示，来自基层一线的代表中，97.8% 获得过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和全国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摘自《新华网》

十八大后中国改革道路有何选择

改革、发展和稳定曾经是中国改革路径的理想状态。通过改革尤其是体制的改革得到发展，而改革和发展则为社会稳定创造坚实的基础。但现在的情况则不是这样，很多方面表现得很糟糕，“无改革”已常态化，发展也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

未来的路怎么走？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乐意不乐意，要发展和进步，最终还是要回到改革的道路上来。如果“不改革”或者“改革不动”的情形再继续下去，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情况。当然，理想地说，无论是苏联道路、激进变革和革命都是需要努力加以避免的。而权威主义的治

理方式也难以继。要预防所有这些情形的出现，就是要回到改革道路。人们所说的“中国道路”应当是一条改革的道路，而不应当是一条不改革的道路。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国道路”是以往改革的产物，这条道路是否可以持续，就取决于进一步的改革。

如果中国选择改革，中国可以选择那些改革道路呢？无论从中国自身的改革经验还是国际经验来看，未来的中国改革道路存在着至少三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欧洲道路。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福利资本主义，并非资本主义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是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产物。当然，福利制度的成长也经历了一个非常长的历史时期，在早期福利水平也是非常低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也实现了另外两个重要转型。一是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开始转型成为中产阶级。一方面是福利制度的确立，另一方面是劳动工资水平的提高，两者的结合，有效地实现了这个转型。二是从精英民主开始转型成为大众民主。工人阶级运动的一个直接政治结果，就是促成了民主的大众化。

今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欧洲。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城市工人罢工和各种抗议形式（包括自杀）是对低工资和恶劣劳动条件的反应。所不同的是，中国还存在着农村农民的抗议运动。尽管中国还没有发展到欧洲当时的程度，但如果社会改革找不到突破口，社会政策停留在低水平，中国很有可能演变成欧洲的发展道路。

中国所面临的第二种是东亚道路。

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走的道路和欧洲不同。在强调市场的作用方面，东亚经济体和欧洲类似，但社会发展和建设方面则很不相同。无论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东亚经济体的政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极推动社会的发展。鉴于欧洲的经验，政府往往先发制人，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从而避免了类似于欧洲那样的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

在东亚，只有韩国有比较激烈的劳工运动，但仍然远较欧洲温和，其它经济体由于社会政策的确立而得以和平发展和转型。不难看到，这些东亚经济体在 20 多年的时间里，不仅造就了经济奇迹，而且也造就了社会奇迹，即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在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改进能力、特有的企业终生雇佣制度、政府方面的工资倍增计划等因素，很快促成了中产阶级的成长。在台湾和香港，中产阶级的成长主要是因为中小企业的大发展和政府方面的社会政策。新加坡政府的

作用更大，建国之后就确立了“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后来又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出台和完善医疗和教育政策等，为中产阶级造就了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基础。

中国所面临的第三种选择就是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道路。

从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社会的各方面也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也会出现此陷阱。从经济上说，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要建立内需社会。但内需社会的建设不仅关乎于经济，还有两个方面的关键因素。一是在于社会政策方面的突破，二是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无论是欧洲还是东亚经济体，内需社会都是依赖这两个要素建立起来的。这两方因素的发展，必然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实际上，内需社会和中产阶级社会是两个可以互相替换的概念。

中国如果下一阶段找不到社会政策改革的突破口，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不仅要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也有可能导致激进的政治变化，包括民主化。和其他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样，中国也会陷入可以称之为一种“低度民主陷阱”的局面。无论在拉丁美洲、非洲还是亚洲，中等收入陷阱更多的是一种结果，其前提就是低度民主陷阱。东亚经济体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中等收入升级到发达经济体，主要是政府和社会力量的结合。但一旦在经济低度水平的时候发生大众民主化，一个社会很容易进入低度民主陷阱。在这样的社会，大家谁都接受民主这种形式，但民主往往演变成为政治恶斗，各派政治力量动用自己的支持力量，争取分蛋糕，多分蛋糕，而没有任何政治条件，促使政治力量把精力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对中国来说，这三种道路选择都有可能。尽管不同的客观因素，在推动着中国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执政者主观的选择也很重要。执政者可以动员资源去避免一些不理想的路径，而把改革道路导向另一些理想的路径。很显然，在这些改革道路选择中，东亚道路比较理想。不管如何，和平发展是中国一直在坚持走的改革道路。而对新的形势，要继续走这条道路，就要大力进行社会改革，确立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改革的突破，不仅有利于消费社会的确立，从而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为未来大众民主化，打造一个理性社会，奠定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摘自香港《大公报》



广东多项新规从严治党

“对党政正职实行任中审计、“逢离必审”，2013 年试行审计结果公开并逐步推广”、“探索实行党员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并在一定范围公示制度，2014 年前完成试点并逐步推开”、“隐瞒财产一经查实先停职再调查”，这是近日出台的《广东省从严治党五年行动计划》提出的众多创新措施之一。广东省纪委负责人指出，希望以此对领导干部严格管理和监督，实现对腐败行为“零容忍”。

最近几年，广东反腐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尤其自今年 2 月“三打两建”活动启动之后，广东不断传出有充当“保护伞”的官员被“双规”或“双开”。仅半年时间，已相继有 28 名厅官和 123 名处级以上干部落马。

在加大对贪污官员的查处同时，广东也积极在预防腐败上进行制度探索，近日出台的《广东省从严治党五年行动计划》中，就有多项创新措施。《行动计划》提出，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的党支部从下一次换届选举开始实行“双直选”制度，即由党员直接选举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将进一步推进竞争性选拔，到 2015 年，新提拔的委任制干部中，通过竞争性选拔的不少于 50%。

“裸官”不得任正职

民间对加强“裸官”及“问题官员”的管理呼声很高，对此，广东提出了诸多限制，规定“曾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或行政撤职及以上处分的干部、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干部，不得提任市、县（市、区）、镇（乡、街道）党政正职，省、市、县（市、区）党政工作部门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正职，重要和敏感部门领导班子成员。”

《行动计划》中规定，曾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干部一般不得提任领导职务，曾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干部一般不再提拔任用。实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位禁入制度，因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人员、对企业破产负有重要责任的人员、因违法违规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的人员，禁止担任国有企业领导职务。并将实行“违纪违法官员选拔过程倒查制度”，对原来已有违纪违法问题、提拔任职后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以上处分的官员，应在作出处分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启动对其选拔过程的倒查程序。

另外，还将全面落实党政正职不直接分管人、财、物和行政审批、工程建设的规定。从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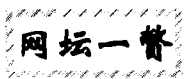
年起推行下一级党委主要负责人和同级党政部门主要负责人向纪委全会述职述德述廉并接受评议制度。

明年推廉政报告制度

此前，广州番禺城管局政委蔡彬被爆出拥有 22 套房产，引起舆论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关注。此次广东也在《行动计划》中特别就此作出规定，提出“党员领导干部要如实报告个人的收入、房产、投资、婚姻变化及配偶子女从业、移居国（境）外、计划生育等情况。对个人应报告的重要事项隐瞒不报告或作虚假报告的，一经发现、查实，一律先停职再作调查。从 2013 年起推行考察对象廉政报告制度，考察对象在接受组织考察时要如实填报个人家庭财产、投资经商、廉洁从政等情况，并以适当方式在谈话对象中公开，报告内容失实或经核查存在影响任用问题的，取消任用资格。探索实行党员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并在一定范围公示制度，2014 年前完成试点，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开。”

另外，2013 年制定实施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办法，并进行试点，推进干部能下、能出。还将对官员实行离职后从业、近亲属从业限制。为制止公款“大吃大喝”，广东还规定，从 2013 年起，市县区推行“三公”经费零增长。

——摘自《大公报》



启动“大国公关”迫在眉睫

11 月 8 日，“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首次被明确写进党代会报告。国力不是国家公关的唯一因素，这一点已在中国领导层和民间形成共识。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有了很大分量，但中国的声音和文化影响即软实力，却没有相应的地位。中国启动“大国公关”迫在眉睫。

西方看中国的变化

当今中国在世界眼中的形象究竟与过去有哪些不同？资深外交家、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将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分成五个阶段：

在共和国成立初期，经历大跃进、大饥荒等历史事件后，西方认为中国政权无法长久，谓之

“短命论”;

1975 年, 中国再次提出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怀疑论”出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西方对华开始持“崩溃论”;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 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 不仅自己没有落马, 还造福亚洲和整个世界, 表现优异反而导致“威胁论”甚嚣尘上。

2005 年 9 月, 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中提出, “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 这被看作“中国责任论”登上舞台的标志。2006 年 10 月, 欧盟委员会发表了新的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与中国: 更密切的伙伴、增长的责任》, 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中国责任。

吴建民认为, “责任论”与前述四项恶意论断不同, 不应该不问青红皂白加以批判, “毕竟这是一种基于实力基础的正面期待”。

尽管西方社会围绕中国的种种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 但每每遭遇责问和挑衅, 有一点总能令吴建民底气十足, “中国在短短几十年使几亿人口脱贫, 这被认为是当代世界经济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不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人场合, 从来无人能够反驳。”

启动国际公关战略

长期以来, 在公共外交、国际传播领域, 中国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是外宣产品几乎很难进入国际社会主流, 特别是难以进入西方社会主流。一位在驻美洲国家使馆工作的外交官对记者说, 国内运来的一些印刷精美的宣传册, 多是中文宣传品的简单翻译, 老外看了“云山雾罩”。“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介绍中国”仍然是个庞大课题。

据媒体报道, 2009 年年初, 中国政府为了改善国际形象, 争夺国际话语权, 启动了国际公关战略, 计划投入 450 亿元人民币, 加强对海外的宣传, 第一步是以扩大中央媒体的海外业务为主, 包括建立新媒体、增设办事处、吸纳外语人才等。

鉴于西方社会看待中国官方媒体时难以摘掉“有色眼镜”, 由民间资本运营的媒体找到了适合生存的空间, 创立于 2008 年的蓝海电视台就是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家。作为一个面对国际主流社会、传播中国内容、以民间机制运营的英文电视媒体, 蓝海电视台目前有两个 24 小时卫星频道覆盖北美和亚洲, 在包括纽约、洛杉矶在内的美国东西部 3000 万个家庭落地。今年年底, 蓝海电视的目标是在欧洲落地, 明年年初在非洲落地。

因为全部节目都是中国内容，在北京制作，蓝海电视台经常被误认为有“政府背景”，董事长顾宜凡不得不一再解释，从酝酿、开播到现在，蓝海电视台没有从中国政府得到一分钱的资助，力求向西方“折射一个真实的中国”，既不美化也不妖魔化。同样一个事件，蓝海电视致力于向西方观众提供一个“不同于中国官媒的视角”。例如，在近期的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蓝海电视拿出大量时段来介绍来自中国民间的各种声音。

开始尝试主动出击

面对并不乐观的舆论环境，中国开始尝试主动出击。2011年春节前，一部由59个华人出演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被称为“世界十字路口”的纽约时报广场大型电子显示屏上播出。30秒短片，20多天，8000多次高密度传播，中国政府借助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各界名人展示国家形象。此举恰逢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之际，因此被外界解读为中国政府一次重大的形象公关行动。

宣传片播出之后，收获的批评远远多于赞誉。不止一位外国人对媒体谈及此片时称“除了认识姚明，整个片子不知所云。”直到今日，业内人士对其传播效果仍然难以认同，“纽约时报广场四周摩天大楼鳞次栉比高耸入云，平时都是在播放商业广告，在这些极具感官刺激的电子屏幕上循环播放以人物为主角的具有政治色彩的形象广告，难免会给人压抑和压迫之感。”《华尔街日报》的博客则援引一位美方企业高管的话说，“广告令人恐惧，胜过友善”。

60多年来，中国依靠强大的政府资源，建立起一套庞大而完备的“对外宣传”体系进行国家形象输出。但是，在“像营销耐克一样营销国家”的当下，这种单向度的“宣传”模式日渐式微，被双向互动的“专业传播”所逐渐取代。很多人都想知道，8000多次的形象片播放，有多少外国人真正看过？又有多少外国人借此真正了解中国？

尽管各方质疑排山倒海，但没人能够否认，国家形象片在纽约时报广场的播出行为本身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因为广告毕竟是一种区别于以往“灌输式”的现代沟通方式。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刘康这样肯定此片的正面意义：也许不会立刻改变多数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政治印象。但它却具有水滴石穿的功效，逐步缩小认知和心理的鸿沟。

公共外交提升形象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外交部长杨洁篪指出，公共外交是中国外交重要的开拓方向，公共外交现在是应运而生、正逢其时、大有可为。2011年，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作全国政协常委

会工作报告时指出，将不断深化人民政协公共外交实践。

据外交部公共外交办公室透露，日前外交部对驻外使馆高级外交官外出演讲、接受采访、投书报纸的情况都有量化考核，“每位驻外大使都应该是演讲家。”外交部也正在向各主要驻外使馆派遣高素质的公共外交官。与大力拓展公共外交相对应，除了对外语干部的需求，外交工作现在非常需要公关、策划人才。今年的外交部公务员招考中，就专门设立了面向新闻与传播学、公共关系等专业考生的职位。

在吴建民看来，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在乎过自己的形象，究其原因在于，随着中国同世界的交往日益密切，合作日益加深，中国投射在外部世界的形象，成为对方与中国合作采取态度的依据。

国家形象来自国民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人员交往越来越密切，中国公民个人言行、中国企业所作所为所汇聚成的中国形象，往往比任何外宣手段起到的效果都更加直接和生动。

据统计，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间，我国累计出境人数仅为28万人次。2001年，中国公民出境总人数为1660万人次。十年后的2011年，我国出境公民达到7025万人次，境外设立企业1.8万家，企业境外总资产超过1.5万亿美元。

最令吴建民痛心的是，一些中国公民走出国门后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后忽略履行社会责任，甚至有破坏当地资源环境的行为，这是对中国形象极大的污损，“我们在一些国家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传统情谊和良好形象，有时候会因为一起事件消失殆尽。”

今年9月2日，一架由瑞士苏黎世飞往北京的航班因为两名中国乘客空中斗殴而导致被迫返航；刚刚结束的中国黄金周之后，大批满载而归的中国旅行团大包小包塞满了从欧洲返航的航班，吵闹的客舱令人备受打击……看到这些新闻，一直在研究传播学、交流学的吴建民不禁唏嘘：“一切的传播手段都只是辅助。只有真正自信从容的国民，才能成就美好优雅的大国。”

以上信息均来自权威报刊和官方网站

刊头题字：张甫雄 责任编辑：镇江市图书馆期刊部

地址：镇江市解放路17号

电话：84447365 邮编：212001

E-mail: zjtsgbk@126.com